

抱朴子内篇道意 中医与中国文化

武斌 著



辽海出版社

中医与中国文化

武斌 著

辽海出版社

© 武斌 2005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医与中国文化 / 武斌著. — 沈阳: 辽海出版社,
2005.8

ISBN 7-80711-499-5

I. 中… II. 武… III. 中国医药学 — 医学史 — 研究
IV. R 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102625 号

责任编辑: 段扬华 吕贤超

责任校对: 顾 季

版式设计: 顾 季

封面设计: 马寄萍

出 版 者: 辽海出版社

地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编: 110003

电话: 024-23284469

E-mail: dszbs@mail.lnpgc.com.cn

<http://www.lhph.com.cn>

印 刷 者: 沈阳市第六印刷厂

发 行 者: 辽海出版社

幅面尺寸: 170mm×240mm

印 张: 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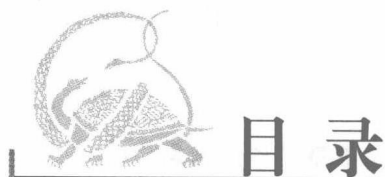
字 数: 320 千字

出版时间: 2006 年 1 月第 1 版

印刷时间: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9.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第一章 神农尝百草

- 一 中国医史上的传说时代/1
- 二 既景迺冈，相其阴阳/5
- 三 明寒热温凉之性/7
- 四 巫医不分，亦巫亦医/11

第二章 中医的初创

- 一 扁鹊的“独立宣言”/15
- 二 中医学之初具规模/20
- 三 上古奇书《黄帝内经》/23
- 四 不通《易》不可为大医/26

第三章 杏林春暖

- 一 现存最早的医案/31
- 二 “建安三神医”/33
- 三 医门圣书《伤寒杂病论》/40
- 四 魏晋风度与服散之风/43

第四章 道林医生

- 一 援医入道，援仙入医/47
- 二 世号仙翁，方传肘后/52



三 “山中宰相”陶弘景/55

四 凿开经路，名魁大医/57

第五章 悠悠脉象

一 千般疾难，不越三条/61

二 脉学与诊断术/64

三 时下针石，辄应时而效/68

四 独特的按摩术/75

五 麻沸散与手术刀/77

第六章 长生之梦

一 彭祖的传说与不死药/81

二 寻找“不死之乡”/86

三 服食与炼丹/91

四 天地为炉鼎，身心为药物/96

第七章 养生之道

一 养生之法，重人贵生/101

二 不动成黑卧，微劳学鸟伸/107

三 药食同源/111

四 不治已病治未病/118

第八章 情欲之间

一 性医学与性文化/127

二 性保健及疾病防治/130

三 房中之术，以广养生/135

四 两神相搏，合而成形/141

第九章 瘟疫与防疫

一 阴阳失位，寒暑错时/147



- 二 瘟疫与民间信仰/152
- 三 从“人痘”到“牛痘”/155
- 四 吴有性的“瘟疫论”/161

第十章 本草与方剂

- 一 以草药治病为本/165
- 二 唐宋两朝之官修本草/170
- 三 李时珍与《本草纲目》/174
- 四 配伍与方剂/178
- 五 中药之炮熬煮炙/183

第十一章 医事制度

- 一 医官与律令/187
- 二 安济坊：古代的酒店/191
- 三 药局与药铺/194
- 四 刊刻医书，以济众要/198
- 五 师徒传授与官办教育/200

第十二章 医生家族

- 一 大医精诚/205
- 二 儒医同道/208
- 三 业医世家/211
- 四 皇帝身边的医生/214
- 五 坐医与游医/218
- 六 欺逛俚俗的庸医/224
- 七 鬼道惑众的巫医/226

第十三章 医史杂说

- 一 中医的解剖学/229
- 二 听讼清明，洗冤泽物/234



- 三 军营里的医生/238
- 四 中医的护理/241
- 五 “金元四大家”/244
- 六 中医与佛教/248
- 七 回回药方/251
- 八 中医与文学艺术/253

第十四章 中医在海外

- 一 中医药文化西向流传/259
- 二 朝鲜的东医学/261
- 三 日本的汉方医学/26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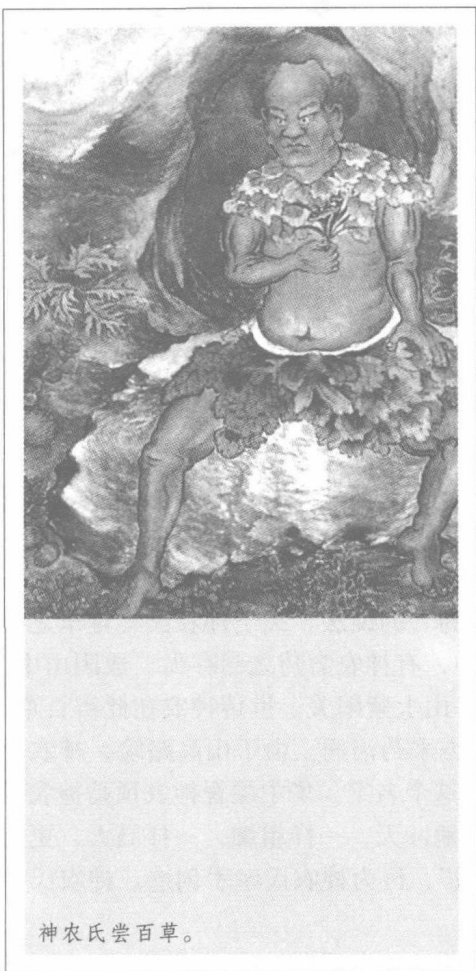
第十五章 当中医遇到西医

- 一 西医之东传中国/269
- 二 探索中医之改良/273
- 三 维护中医药的抗争运动/276

第一章

Di Yi Zhang

神农尝百草



一 中国医史上的传说时代

有一位德国医生说过，医疗的艺术和人类的历史一样久远。凡有人类之处就有病痛，有病痛就有医术的发明，人类生存和保健的需要，是医学产生的基本条件之一。世界各民族因此各拥有其特有的原始医学。和许多民族一样，中国的医学最初萌芽于人类的早期生活。在中国古史传说中，有一个“三皇”“五帝”的传世谱系，通常是把伏羲、女娲、神农称为“三皇”，把黄帝、颛顼、帝喾和尧、舜称为“五帝”。传说中把许多文化发明都归功于他们，其中医药的创制被认为是神农氏的功劳，这些传说勾画出了中国医药的史前史。

神农氏也被称为炎帝^①，是中华民族始祖之一，同时又是中国医药学最伟大的创始者之一。《史记通鉴》说：“神农尝百草，始有医药”。《淮南子·修务》记载：“神农……尝百草之滋味……一日而遇七十毒。”《帝王世纪》说：“神农……尝味草木，宣药疗疾，

① 传说中的神农氏，众多史册中说他就是炎帝，也有说神农氏和炎帝是两个人的。



神农架的神农祭坛。

救夭伤人命。百姓日用而不知，着本草四卷。”《路史·外纪》也说：炎帝神农氏“磨蜃鞭茛，察色腥，尝草木，而正名之。审其平毒，旌其燥寒，察其畏恶，辨其臣使，厘而三之，以养其性命而治病。一日间而遇七十毒，极含气也。”这些记载生动地描述了炎帝神农氏以及先民们在与自然、疾病的斗争中，不断地探索、实践、发现、发明和总结医药知识和医疗经验的情景。

在传说中，神农氏用一种叫“赭鞭”的神鞭，来鞭打各种各样的药草，有毒无毒，或寒或热，都令现出，他就根据这些草的赋性给人们治病。《搜神记》说：“神农氏以赭鞭鞭百草，尽知其平毒寒温之性”。《史记补·三皇本纪》也有“神农氏以赭鞭鞭草木，始尝百草，始有医药”的说法。关于神农氏尝百草之遗迹，《述异记》也有记载：“太原神釜冈中，有神农尝药之鼎存焉。成阴山中，有神农鞭药处，一名神农原，亦名药草山。山上紫阳关，世传神农在此辨百草，中有千年龙脑。”神农氏曾在湖北神农架地方采药治病。由于山高路险，神农氏也只好搭架而上，因此就留下了“神农架”这个名字。华中屋脊神农顶是神农架的最高峰，上有一片方正的冷杉林，根根拔地冲天，一样粗细，一样高大，更奇异的是排列整齐，巧夺天工，称之为“木城”，传为神农氏亲手创造。神农氏在此广种世间珍稀药材，救治百姓。

相传神农氏晚年，到南方巡视，了解民情，尝草采药，为民治病，不幸误尝断肠草中毒身亡，“崩葬长沙茶乡之尾”，即今湖南省株洲市炎陵县鹿原陂。坐落在这里的炎帝陵一直受到历代的炎黄子孙的敬仰和祭祀。据古籍记载，西汉时



这里已有炎帝陵，唐代已有奉祀，至宋代，太祖赵匡胤奉炎帝为感生帝，于是“立屈陵前，肖像而祀”，并设守陵记，禁樵牧。另有一说是炎帝死于尝百足虫。明代人周游在《开辟衍释》中说：“传言神农乃玲珑玉体，能见其肺肝五脏，此实事也。若非玲珑玉体，尝药一日遇十二毒，何以解之？但传炎帝尝诸药，中毒者能解。至尝百足虫入腹，一足成一虫，炎帝不能解，因而致死……”

神农氏还被认为是农业的创始者，带领部属从游牧生活转为农耕定居生活。“神农氏”一名即“农之神”，是主管农业的神人。他发明了耒耜，开始和发展了耜耕农业，并在此基础上发展了畜牧业，丰富了人们的食物品种，改善了人们的饮食结构。《白虎通义》说：“古之人民皆食禽兽肉，至于神农，人民众多，禽兽不足，于是，神农因天之时，分地之利，制耒耜，教民农作，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故谓之神农也。”《淮南子·修务》也说：“古者民茹草饮水，采树木之实，食羸臠（蚌）之肉，时多疾病毒伤之害。于是神农氏始教民播种五谷。”汉代王充在《论衡》中则说：“神农之挠木为耒，教民耕耨，民始食谷，谷始播种，耕土以为田，凿地以为井，井出水以救渴，田出谷以拯饥，天地鬼神所欲为也。”中国古代先民们对定居点的选择和建立，也始之于炎帝神农氏所处的时代。《淮南子·修务》记载：“……神农始……相土地宜燥湿肥（土尧）高下，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有所避就。”《路史》也说：神农“相土停居，令人知所避趋。”避恶地趋善地，建筑一些能够使用比较长久的房屋、水井及其他生产、生活设施。在神农氏时代，人们还发明了制陶技术。《周书》记载说：“神农耕而作陶。”《资治通鉴外纪》也说：“神农……作陶，冶斤斧。”此外，《路史·外纪》记述神农氏“……因时变火，以抑时疾；以炮以燔，以为醴酪^①。……于是埏埴以为器而人寿。”进一步优化了对火的使用，扩大和稳定了食物的来源，促进了酒的发明，改善了人类的生存条件，因而人类的寿命也相应有所提高。

中国古史传说中的医药人物，除了神农氏之外，还有伏羲、黄帝、伏羲季、岐伯、雷公、桐君、鬼臾区、俞跗、少俞、伯高等人。比如伏羲创八卦，熟知阴阳五行与疾病的相关性，《帝王世纪》记载伏羲氏“尝百药而制九针”。关于伏羲季，《黄帝内经》中岐伯在回答黄帝的有关问题时指出：“色脉者，上帝（上古之帝）之所贵也，先师之所传也。上古使伏羲季，理色脉而通神明，合之金木水土，四时八风六合，不离其常，变比相移，以观其妙，以知其要，欲知其要，则色脉是矣”。明代徐春甫撰《古今医统》认为“伏羲季，黄帝时人，岐伯师也。”岐伯为黄帝的太医，而黄帝称他为天师。《帝王世纪》记载：“帝使岐伯

^① 醴酪，即酒。



尝味草木，典主医药经方，本草素问之书咸出焉。”宋代的《重广补注黄帝内经》中强调：“求民之瘼，恤民之隐者，上主之深仁，在昔黄帝之御极也。……乃与岐伯上穷天纪，下极地理，远取诸物，近取诸身，更相问难，垂法以福万世，於是雷公之伦，授业传之，而《内经》作矣”。今传《素问》基本上是黄帝问，岐伯答，以阐述医学理论，显示了岐伯氏高深的医学修养。岐伯与黄帝关系密切，而中国医学素称“歧黄”或“歧黄之术”。相传雷公是黄帝之臣，擅长于教授医学之道、针灸医术与望面色而诊断疾病之理论等。“黄帝坐明堂，召雷公而问之曰：子知医之道乎？雷公对曰：诵而颇能解，解而未能别，别而未能明，明而未能彰，足以治群僚”。桐君也是黄帝之臣，从事采药，对药物性味作用相当了解，以擅长本草著称，著有《药对》4卷及《采药录》。《古今医统》中记载：桐君“识草木、金石性味，定三品药物，以为君臣佐使。”即是桐君借由说明花叶形色，而讨论君臣佐使相需的道理。鬼臾区系神农氏后相传十世之世医，也是黄帝之臣，擅于五行之说。其他如俞跗、少俞、伯高等人，也都是黄帝的臣子。

此外，传说中还有所谓“药兽”。元代人陈芬在《芸窗私志》中说神农氏尝味百草，是由“药兽”衔来药草而后进行的。他说：“人有疾病则拊其兽……兽辄野外，衔一草归，捣汁服之即愈，后黄帝纪何草起何疾，久之，如方悉验。”《芸窗私志》还说：“神农时，白民进药兽……授之语，语如白民所传，不知何语。语已，兽即如野外，衔一草归，……古传黄帝尝百草，非也。故虞卿曰：黄帝师药兽而知医。”

现代历史学家范文澜指出：“古书凡记载大发明，都称为圣人。所谓某氏某人，实际上是说某些发明，正表示人类进化的某些阶段。”我国古代传说中关于燧人氏、伏羲氏、神农氏及黄帝等圣人创造医学的故事，实际上反映上古不同氏族集团群体和疾病斗争的实践中对医药经验的积累和贡献。神农、黄帝等不过是这些氏族群体的代名词，表示着医学发展有不同阶段。另一方面，当时有一些比较留



神农氏在民间奉为“药神”，香火不断。



心医药而又具有创造才能的人，他们善于总结经验，能探寻出更有效的药物和更好的治疗措施，因而在推动医药发展中起着更突出的作用。正是这些人的探索和实践，肇开洪基，为在黑暗中摸索的原始医学，开出了一线光明。

二 既景迺冈，相其阴阳

上述神农氏除了医药方面的那些发明，比如筑屋居住、制造陶器、发明农牧业改善人们的食物结构等等，都与原始人类的卫生保健有着密切的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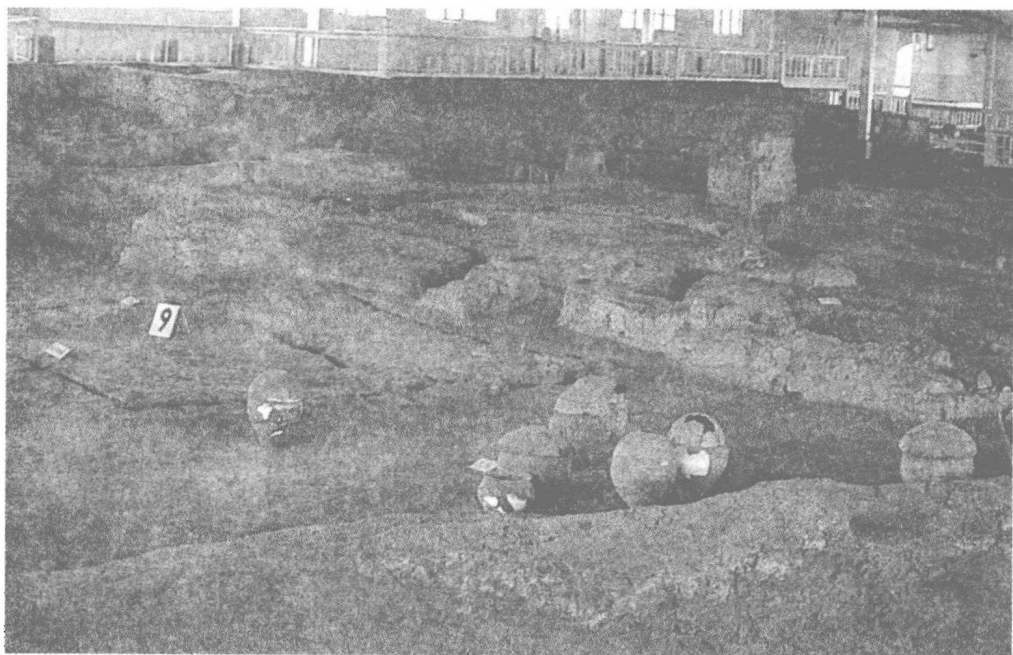
人类在原始社会初期还不会建造房屋，选择干燥、向阳和背风的天然洞穴为栖息处所，就是我们所说的“穴居”。后来，人们逐渐走出洞穴，在地面上建造栖身之所，产生了“巢居”及“穴居”并存。《墨子·辞过》曾指出：“古之民未知为宫室时，就陵阜而居，穴而处，下润湿伤民，故圣王作为宫室。为宫室之法，曰：室高足以辟润湿，边足以圉风寒，上足以待雪霜雨露，宫墙之高足以别男女之礼。”《太平御览》中记载：“上古皆穴居，有圣人教之巢居，号大巢氏。今南方人巢居，北方人穴处，古之役俗也。”“巢居”是指人们为了保护自己、躲避风雨及野兽，而将树木、杂草搭在树上形成的一种形似鸟巢的原始建筑。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由巢居进而开始建造房屋，发展为有墙壁、屋顶的木屋，称为“杆栏式住屋”。“杆栏式住屋”属于木结构建筑，即在选好的建筑基地上，先打木桩，再架木板作为房基，并于其上搭建房室。这种居住形式主要分布在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在浙江余姚的河姆渡遗址发现大量木头建筑构件，如木板、企合板及有榫卯结构的圆木、方木等。杆栏式住屋的下层空间可使上层居室保持干燥、通风，可免瘴疔之气的熏蒸，又可避毒虫毒草之害。《新唐书·南平僚传》说：“土气多瘴疔，山有毒草及沙虱蝮蛇，人并楼居”；《太平寰宇记》说：“俗多构木为巢，以避瘴气”，都是说这种建筑方式具有防病（瘴疔、瘴气）的目的。“穴居”是由袋状坑穴，加盖遮雨的防护物组成，主要分布在黄河中上游的黄土高原区域。由于穴壁由黄土构成，地下水、地面水、雨水会渗入室内，产生潮湿现象，因此随着建筑技术提高，逐渐向半穴居发展，形成土木合筑的混合结构房屋。在仰韶文化遗址中，发现有红烧土地面，推断烧烤陶化可能为当时最佳的防潮措施。在龙山文化时期，则已从半穴居发展为地面式建筑。由于人们懂得防潮，使居住条件得以改善，进而减少因潮湿产生的疾病。

房屋建筑也注意了对环境的选择。如《诗经》记有“笃公刘，既溥且长，逝彼百泉，瞻彼溥原。迺陟南冈，觐于京（高丘）。”“笃公刘，既溥且长。既景迺冈，相其阴阳，观其流泉。”诗歌颂扬公刘定居时选择干燥、向阳、寒暖适宜、



接近流泉的地方。《诗经》所歌颂的公刘择地建居室的时代约在夏代。在居住环境方面，居地和公共墓地的分隔制度，为新石器时代以后人们所普遍遵循。人畜隔离也很早被人们所采用。姜寨和半坡遗址均发现有牲畜圈栏。山东潍县狮子行龙山文化遗址出有陶畜舍模型。到了商代，又出现了大型的官方牲畜豢养场地。生活垃圾的处理也受到人们的重视，夏商遗址中都有当时倾倒垃圾的灰坑、灰沟或废弃物的窖穴。夏商都邑遗址还有排污水的地下管道或明暗沟设施。《韩非子·内储说上》说：“（殷法）弃灰于公道者断其手”，就是以刑法制约违反社会公德破坏环境卫生的人。西周已设有专门管理清洁卫生的官职，负责宫廷内外的除草、除虫以及清洁水源的工作。《周礼》还记道：“赤发氏掌除墙屋，以蜃炭攻之，以灰洒毒之，凡隙屋除其狸虫”；《诗经》还记有灭鼠的活动，强调洒扫庭院堵鼠洞，堵好鼠洞熏杀老鼠。对预防传染病流行，保护环境避免污染有积极意义。

起初原始人类以兽皮或树皮覆盖身体以御寒，渐渐又将经过编制的羽毛、树叶、茅草等披在身上。在山顶洞人遗址里，就发现有一端带孔的骨针及纺织用的纺轮，显示人类已经会缝纫技术。浙江余姚的河姆渡遗址还发现木质织布机件，如卷布轴、梭子、分经木等，而仰韶和西安的半坡村还分别有石纺车和陶纺轮出



半坡遗址，距今 6000 年左右。



土，且部分陶器上均留有麻布纹的痕迹，说明当时已进步到纺织麻布和缝制布衣的程度。原始人类从赤身裸体，到以兽皮、树皮充当衣服，以至后来有原始的纺织缝纫活动、衣服的发明，除了扩展人们的生存空间，增强人体对自然界季节、气候变化的适应能力，更有助于减少疾病的发生，并保护生产者及狩猎者以减少外伤发生率，使人类卫生保健更进一步。

火的使用在医药卫生方面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韩非子·五蠹》中说：

上古之世，民食果蓏蚌蛤，腥臊恶臭，而伤肠胃，民多疾病，有圣人作，钻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之燧人氏。

火的使用，推动人类由生食走向熟食，“以化腥臊”，缩短人体消化食物的过程，还可对食物进行消毒灭菌的工作，从而增加人体的抗病能力。火还是热敷、灸疗、汤药等治疗方法的重要来源。陶器的发明、制作和应用，在人类生活中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在此之前，食物的加工只能用烧烤的方法进行。有了陶器，就可以用煮或蒸的方法来加工处理食物。由此，可以更加彻底地消毒、灭菌和杀死寄生虫，更加有利于人体的消化和吸收。陶制的贮存器又便于谷物、水和液态食物的贮存，减免食物在贮存过程中的损耗和受污染而变质。

为改善饮用水质，克服水土条件的制约，人们还采用凿井以汲洁净水的技术。河姆渡遗址发现的一口距今 7000 多年的古井，用桩木作护壁，上盖顶棚，可见当时人们对饮用水的保护。嘉善新港遗址发现一口良渚文化古井，用剖开的原木挖空后做井壁，井底铺河蚬贝壳，以过滤净化地下水的渗入。这一带河道交错，水源不乏，但先民仍然重视对水井设施的精构，说明当时人们已经具备了相当的饮水卫生知识。中原地区的水井出现稍晚一些。《世本》说尧臣“伯益作井”，《史记·五帝本纪》说“瞽叟复使舜穿井”。河南汤阴白营发现的龙山古井，成圆角正方形，井壁附设方形木构井圈，建造已经相当进步。在其他龙山文化遗址和夏商遗址中，都有古井发现。《周易》记述一新来的邑主看到当地饮水情况说：井水太浊了，喝不得，要淘干净，才可汲用。《周易》还强调，井壁垒好后，井水变得清凉爽口；要求人们打完井水后要加井盖，防止因炊污水而染病，才会大吉。

三 明寒热温凉之性

人类在早期的生活实践中，逐渐积累了一些关于疾病的知识，也发展出一些



原始的治疗方法。《黄帝内经》中说：“人有卧而有所不安者何也？歧伯曰：藏有所伤及。精有所之寄，则安。故人不能悬其病也。”人卧而不起与有所不安，即是疾病。在《山海经》中保存了许多远古生活以及夏商时代的社会生活素材，其中记有大量的疾病名称，有人统计，其中属内科的有 22 种，属外科的有 21 种，属五官科的有 6 种，属妇科 1 种，属传染病的疫疾、大疾 2 种。总计 52 种。但是，《山海经》的疾患定名分类还比较混乱，有的据病象，有的据病因，说明当时的医学知识尚处在萌芽时期。在殷墟甲骨文中，也有很多关于疾病寿夭的卜辞，对人体生理、解剖、疾病及其症状的描述比较直观具体，亦累积较多对病因、诊疗的经验。商代人称疾病为“疾”，甲骨文“疾”字像一个人卧一板榻津津出虚汗状，以患者病态取意，即《说文》所说的“有疾病象倚著之形”。考古学家胡厚宣统计，仅《甲骨文合集》就收录了记载有关疾病的甲骨 320 片，计约 1000 条。甲骨文中有人体器官的记载，还记有内、外、妇、儿、眼、口腔、耳鼻喉等科 40 余种疾病，有疟、蛊等病名，有疾年、雨疾、降疾等流行病的记载。胡厚宣先生曾据此写有专著《殷人疾病考》。甲骨文反映疾患种类名称要比《山海经》明了许多，一般是根据病发部位或病灶所在确定所患何种疾患，有的病又有细分，所记疾患大多具体实在。比如“贞妇好息惟出疾”。妇好是商王武丁之妃，这句话说她患在气息不畅，大概属于感冒鼻塞或呼吸道感染。

先民们生活实践中，逐渐积累起来比较丰富的用药知识。人类早期对动植物认识缺乏，在找寻食物的过程中，经常会误食一些有毒的东西，因而引起呕吐、腹泻、昏迷甚至死亡，而吃了某些动植物，却能够消除或者减轻身体的一些病痛。经过无数次经验后，逐渐获得辨别食物和毒物的相关知识，了解了它们的治疗作用。比如《山海经》说某些动物“食之无肿疾”、“食之无卧”、“食者部蛊”、“食之不疔”、“食之不肿，可以已痔”等等。遇到患有某种疾病，便有意地选择某些动植物来进行治疗。久而久之，积累了许多经验。后来又逐渐探索其中的规律，进而总结归纳出理论来。由于中国古代药物学知识是从尝试植物开始，中药中又以植物类所占的比例最大，故古人称药物学著作作为“本草”。有人统计《山海经》中记载的药物名称，其中矿物类药有 5 种，植物类药 28 种，木类药 23 种，兽类药 16 种，鸟类药 25 种，水族类药 30 种，其他类药 5 种，总计 132 种。这些药物中有一部分至今仍在使用，大部分则不得而知。药方还十分简单，都是单药单方单功用，没有复方。殷墟甲骨文中记载了大量的医药内容，懂得植物、动物、矿物及酒的药用。商代遗址中也有许多药物出土。最早的治疗方剂，仅用单味药咀嚼吞服，而到了商代，由于药物品种增多及用药经验较丰富，便开始采用多种药物合用，以水煎煮后，饮汤液的服药方法。



汤液的服药方法据说是商代初年的伊尹所创。伊尹名挚，是商汤时的宰相。汤与有莘氏通婚，伊尹为有莘氏陪嫁奴隶，因擅长烹饪，故为汤王的厨师。他用医食调味的道理，针砭时政，得到汤王的赏识，被任命为宰相，后来协助汤消灭夏桀，建立商朝，成为辅佐商汤得天下的要人物。商汤死后，传到其孙太甲，太甲想要改变先王的建政要领，伊尹便以开国功臣身分，将太甲送至桐宫，使其了解民间疾苦，经过三年，再迎太甲回宫，并交还政权，故世人称伊尹为商王朝第一个贤宰辅。关于伊尹创始汤液之说，在《资治通鉴》中曾记载：伊尹“作汤液本草，明寒热温凉之性，酸苦辛甘咸淡之味，轻清重浊，阴阳升降，走十二经络表里之宜。”伊尹善于烹调，又精通医学，将烹调食物的经验用于配制汤液并非难事。汤液即汤



陶塑孕妇，距今 5000 多年，辽宁喀左东山嘴出土。

剂，其方法与烹调食物相似，即是将各种药物加水煎煮而成，服用方便，用药种类多，可经由相互作用，促进吸收，并降低药物的副作用，是中医治疗疾病的主要剂型之一。汤液的发明便于药物配伍应用，是商代人们对当时用药经验的总结，它为提高疗效、减低毒性的深化研究以及日后方剂诞生创造了条件。

我国最晚在夏代已能人工造酒。如《战国策》：“帝女令仪狄造酒，进之于禹。”据考古发掘，发现龙山文化遗址中，已有许多陶制酒器，在甲骨文中也有记载。藁城县台西村商代墓葬出土之酵母，在地下三千年后，出土时还有发酵作用，汉代班固在《白虎通·考点》中亦有芳香的药酒意思的解释。罗山蟒张乡天湖商代墓地，发现了我国现存最早的古酒，它装在一件青铜所制的容器内，密封良好。至今还能测出成分，证明每一百毫升酒内含有 8239 毫克甲酸乙酯，并有果香气味，说明这是一种浓郁型香酒，与甲骨文所记载的相吻合。周代酿酒已发展成独立的且具相当规模的手工业作坊，并设置有专门管理酿酒的“酒正”、“酒人”、“郁人”、“浆人”、“大酋”等官职。酒是最早的兴奋剂和麻醉剂，有通血脉、养脾气、厚肠胃、润皮肤、去寒气、制药剂、消毒杀菌的功效。酒的发明和应用，促使用药范围不断扩大。《黄帝内经》指出古人作“汤液醪醴”，其



医疗作用是“邪气时至服之万全”。古代医生治病时常借助于酒力，使药物取效，所以有所谓“酒为百药之长”的说法。从古“醫”字也可以看出古代医和酒的关系。《说文解字》说：“醫治病工也……从酉”。“醫，病声，酒所以治病也。”又说：“酉，八月黍成，可以酎酒。”在商代至周初文字凡是“飧酒”之酒都“酉”，甲骨文酉表示以罐储粮，发酵成酒，形似酒坛，形象地反映了当时真实的历史文化。从“醫”字的结构可以看出“醫”字用病声和酒二者会意组成，说明古代医疗与酒关系甚密，体现了酒在医药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

除了药用动植物的相关知识外，人们还很早发明并广泛应用热熨、针灸、推拿、导引、外治等方法。北方寒冷地带的人最早使用热熨疗法。《黄帝内经·素问》中说：“北方者，天地所闭藏之域也。其地高磷居，风寒冰冽，其民乐野处而乳食。藏寒生满病，其治宜灸炳”。当时人们发现，局部取暖可以消除或减轻某些病痛，于是就发明了原始的热熨法。后来又发现用树枝或干草点燃后对人体表面做局部固定的温热刺激，能治疗更多的疾病，在此基础上发明了灸法。

《山海经》说：“高氏之山，其下多箴石”，郭璞注说：“可以为砭针治痈肿者”。《淮南子·说山训》说：“医之用针石”，高诱注说：“针石所抵，弹人痛瘞，除其恶血”。砭石是人们最初使用的医疗工具，为了适应医疗需要，又分不同的形制，有利刃的即镰石，主要用来切开伤口，排脓放血；锋锐的即针石，可用来刺激身体的某些部位以消除疼痛；若为球形或扁圆形，则可用来按摩或热敷以缓解疾病症状，砭石的使用，可说是外科及针灸疗法之开端。商代的针砭医疗器具在各地遗址中时有发现。1955年在郑州商代遗址出土一枚玉质剑状砭石，1973年在河北藁城台西村商代遗址出土了一枚医用石镰，即镰形的砭石。在殷墟大司空村一座商墓的人架背下，发现两件骨锥，呈八字形放置，锥尖对人体，其中一件刺及胸椎骨。骨锥刺破肌肤而深扎体内，似乎属于针刺治疗失败致死的病例。《盐铁论·轻重》说道：“拙医不知脉理之腠，血气之分，妄刺而无益于疾，伤肌肤而已矣。”商代针砭术还处于早期探索阶段，疗效还不成熟，所谓“妄刺”，正是这种探索过程中出现的事象。

外伤、风湿性疾病、关节之风寒湿痹等，是原始社会人们的常见病。对此，史前先民们逐渐积累经验，产生抵御和预防的思想和措施。譬如《吕氏春秋·古乐》在论述原始人歌舞时指出：“昔陶唐之始，阴多滯伏而湛积，水道壅塞，不行其原，民气郁阨而滯着，筋骨瑟缩不达，故作为舞以宣导之。”真实地描述了远古人们生活于阴暗、潮湿的环境里，因此造成人们多患筋骨瑟缩不达的风寒湿痹之关节疾病。人们创用舞蹈运动，预防这些常见病。按摩、导引既用于解除人们因过度的体力劳动所引起的肌肉僵硬、关节劳损，也用于防治因与野兽搏斗或